



日治時期語文教育發展觀察——以傳統漢詩為例

周志仁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博士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秘書

摘要

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僅50年(1895-1945)，就時間長度而言，僅勝荷西與明鄭，由於橫跨近代與現代且是亞洲帝國第一個殖民地，語言教育政策格外引起學界關注與探討，研究者多以官方文宣或報刊雜誌為主。臺灣傳統漢詩對於國語或漢文教育的書寫甚多，這些出自時人的詩歌，是了解日治時期臺灣語文教育發展的第一手資料，從中更能了解臺灣詩人對於語文教育實施的接受。本文將以傳統漢詩對語文教育書寫為主，搭配相關日治官方文宣及報章論述為佐證，從中探析當時新舊派詩人對於語文政策或國語教育的描述，還原當時語文政策的真實面貌。

關鍵字：日治時期、傳統漢詩、語文教育、國語政策、知識分子



Observ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Educ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Tak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s an Example

Chihren Chou*

Abstract

The Japanese colonized Taiwan for only 50 years (1895-1945), and in terms of time, it only surpassed Ming Dynasty. Because it spanned modern times and was the first colony of an Asian empir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has attracted special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discussion, the researchers mostly focus on official propaganda 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ere are many traditional Chinese poems in Taiwan written about Mandarin or Japanese education. These poems from the people of the time are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educa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From thi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acceptance of Taiwanese poe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ems on Japanese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Japanese official propaganda and newspapers as evidence, to analyz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anguage policy or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by the old and new poets at that time, and restore the true appearance of the language policy at that time.

Keywords :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intellectuals

*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with a Ph.D. in Chinese Literature、Secretary, Huludun Cultural Center,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Cultural Bureau



一、前言

臺灣位於大陸與海洋交界處，自古以來即是東西方列強競逐的舞臺。語文教育在四百多年前即在臺灣展開，當時多以培植通譯可代為溝通或傳達政令即可。甲午戰敗後，臺灣割讓予日本，日本政府以高壓殖民政策統治，除了強勢推動國語（日語）教育，也有計畫地消滅漢文的影響力，甚至以國語教育培養臺灣雙語二代，取代原有仕紳的地位，以達到完全統治。日治時期詩人漢文書寫傳統詩歌記敘異族統治下的教育政策，不僅是時代的印證也是作者心聲心語的展示。

二、日治時期語文教育

臺灣為日本明治維新後，第一個殖民地。國語的實施在臺灣分外重要，由於對清甲午戰爭勝利，方取得臺灣，隨軍來臺為伊澤修二執掌文教事務，因此對於漢文是否有保留之必要時，曾經進行一系列討論，基於東亞儒家文化漢文字圈的傳播力量，最後仍保留漢文，以漸進方式，實施國語教育，此一政策實行十分成功，提升臺灣人識字率，甚至日後成為韓國等殖民地的樣板，從語文教育實施，即可見證漢日語在臺灣消長的發展史。

（一）明治時期

明治時期以建立文教機構為先，並對於傳統知識分子採取懷柔政策，不以破壞傳統秩序為主，而是採寬鬆羈縻，再逐步透由公權力介入教材編纂、教學環境、教師資格……等管理措施，使漢學施教環境漸屈劣勢，更於全島普設公學校，最終取而代之，成為教育主流。



1. 芝山巖興學

甲午割臺，日本在乙未後領有臺灣，百業俱廢。臺灣總督府派官員治理臺灣，第一任學務部長為伊澤修二（1851-1917），特別注重國語的力量，從日本選任優秀的教師「為國前驅爭渡臺，願將新學育英才。¹」相信透過語文教育，可以從人心最深處把臺灣日本化。來臺第一件事就是在芝山巖設學校，初名芝山巖學堂。

明治 28 年（1895）7 月 16 日第一批受教者是文風鼎盛的臺北八芝蘭地區子弟，他們於此接受日本語教育，今日士林之名即由此而來。翌年（1896）新年，日本 6 位教師下山赴城中拜年，至基隆河乘舟之際被反日民眾追殺身亡，²史稱芝山岩事件。

總督府於芝山巖立「學務官僚遭難之碑³」並建神社，六氏先生「山廟循循傳國語，荒陬役役教綱常。⁴」日治時代為宣揚殖民文教的重要勝地。許多詩人也作詩緬懷「舊蹟來遊感慨生，芝山岩上最鍾情。⁵」、「如今鯤島人文盛，六氏原來第一功。⁶」由於距離北淡線鐵道不遠，與圓山的臺灣神社連成一氣，是日治時期臺灣學生畢業旅行熱門地點。

2. 國語學校建置

明治 29 年（1896）國語學校於臺北設置（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培養國語教育師資，在當時國語學校為臺灣地區最高學府，⁷特別自日本聘請「維新學界

¹ 李種玉：〈追悼六氏先生〉，《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31 年 3 月 7 日）。

² 翁佳音等：《鑽石臺灣：多元歷史篇》，（臺北：玉山社，2010 年），頁 149。

³ 種村保三郎：《臺灣小史》，（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5 年），頁 266。

⁴ 何子平：〈六氏先生〉，《台南新報》第 5 版（1925 年 2 月 2 日）。

⁵ 林述三：〈登芝山岩懷六氏先生〉，《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1925 年 2 月 7 日）。

⁶ 莊長命：〈芝山巖弔六氏先生〉，《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1915 年 2 月 1 日）。

⁷ 胡律光：《臺灣的教育》，（臺中：莎士比亞文化事業，2007 年 11 月），頁 25。



著名，毗國師資得好評。⁸」的教育專業學者前來從事師範教育，也邀請在地宿儒共事百年大計，「合與朝廷作棟樑。⁹」培育臺灣人才，可謂人才濟濟，甚至吸引秀才謝汝銓等有功名者轉向新式教育。

初期人數較少，受教者多為自願接受日式教育的臺灣士紳子弟，開設初期大致上能「有教薰蕕無類別，同仁棧樸感成全。¹⁰」不分內地一視同仁般地教育。當時「西學新興特例開，學生官費遇優哉。¹¹」公費分發制度，為臺灣師範教育的先河。

在總督府直轄的國語學校不僅教授國語師範師資的養成，也是新國民的養成的機構，¹²在課堂以國語為重，¹³另有算術、地理、歷史等學問的傳授，也重視國民性的建立，除了靜態課堂的學問教授，也特別重視體育教育，每年辦理運動會，展示學習成果，魏清德〈國語學校運動會行〉：

校中旗旛影蔽空，會開運動足威風。

磨煉精神並體力，健兒健足氣豪雄。¹⁴

在日治時期也時常舉辦郊遊、登山等活動，這些都對學生的體魄鍛鍊的十分有益，也培養其熱愛山林，這些都對於視野有益，也增加日後詩歌創作題材的多樣性。當時針對以母語是否為國語者¹⁵再加以分科，而乙科再分為培育師範生的甲部和

⁸ 王人俊：〈追憶故鈴江先生〉，《臺灣教育會雜誌》「文藝」欄（1912年1月1日）。

⁹ 莊長命：〈採取花木植國語學校庭隅〉，《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1907年6月2日）。

¹⁰ 劉克明：〈鈴江團吉先生二十年祭有作〉，《臺灣教育》「漢詩」欄（1930年1月1日）。

¹¹ 黃純青：〈西學堂〉，詩收於龍文本《晴園詩草》。

¹² 臺灣治蹟研究會：《臺灣事蹟綜覽第二集》，（臺北：臺灣治蹟研究會，1919），頁223。

¹³ 古川ちかし、林珠雪、川口隆行：《日本語在臺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年2月），頁22-23。

¹⁴ 魏清德：〈國語學校運動會行〉，《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1904年11月26日）。

¹⁵ 溫又柔著、黃耀進譯：《我住在日語》，（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7年3月），頁10。



國語科的乙部，¹⁶乙部後改為國語傳習所，即是公學校的前身。以「栽培智勇護國才，教育端為發軔地。¹⁷」稱之一點不為過。日本佔領朝鮮「欲覺其民必先覺。¹⁸」的思維，仿照臺灣所實施的國語學校師範制度，實施殖民地教育。

國語學校與實施公費師範教育，畢業即赴公學校就業，收入有一定的保障。然而由於國語學校以母語程度分科，師範部甲科（日籍生）畢業為教諭，屬於判任官；而師範部乙科（臺籍生）畢業為訓導，官等為低一級的判任官待遇（準判任官）。公學校編制為「日本人校長—日本人教諭（—臺灣人教諭）—臺灣人訓導」¹⁹的科層組織，「如何崔浩嚴流品，待遇終殊內地人。²⁰」民族優先義之下，不只薪資不及日本人，就連令臺灣升等與加薪的權益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也有不少知識分子受不了日本校長或教諭的欺壓，而自願掛冠求去，令謀高就。

許多國語學校畢業生不只可從事教職，也有以文名進入臺灣日日新報擔任記者如謝汝銓、魏清德，或進入總督府學務課擔任公務員的莊長命、地方通譯官的何禮謙或商人如邱坤土……等都是師範學校畢業生，這群人在社會領導階層中所占比例長期達 30% 以上。²¹1910 年代後，以製糖業為中心的各種產業開始興盛起來，實業界迫切需要懂日文且受一定教育的臺灣社會菁英擔任經理人才，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生，善日漢語，受雇主喜愛，造成公學校漢人訓導的轉職潮。

當時國語學校課程日漢文兼學，因應漢學教學的需要，又延聘原任職保良局

¹⁶ 東鄉實、佐藤四郎：《臺灣植民發達史》，（臺北：晁文館，1915），頁 437。

¹⁷ 魏清德：〈國語學校運動會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04 年 11 月 26 日）。

¹⁸ 蔡啟華：〈送山口雲洞先生〉，《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11 年 5 月 9 日）。

¹⁹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 年代臺灣教育與社會》，（新北：城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頁 28。

²⁰ 蘇大山：〈臺中道上，十首之十〉詩收於蘇大山《紅蘭館詩鈔》之《婆娑洋集》。

²¹ 祝若穎：〈臺灣師範學校教育課程的開端--日治初期國語學校師範部教育科之探究（1896-1918）〉，《教育學刊》51 期，107 年 12 月，頁 123。



的地方士紳詩人前來擔任教席，如怡山（粘舜音）、翁林煌、黃植亭、李逸濤、陳淑程、陳洛……等人，都曾任國語學校教職，²²亦造就許多學子詩人，如「學究東西新教育，情耽唐宋舊詩章。²³」的王少濤、「興來弄筆幽窗下，三絕能傳鄭所南。²⁴」的魏清德、「芸友篁村有用才，夙昔虛懷已若谷。²⁵」的劉克明、「先生才特秀，新舊學兼優。²⁶」的謝雪漁……等人，他們「當年負笈入稻江，共浴文明新教育。²⁷」諳日語可與官員、學者溝通無礙，也成為臺灣社會中堅，多元且科學的教育方式，增益視野，也為臺灣文壇帶來新面貌。

3.傳習所設置

明治 29 年（1896）除了培育國語師資的國語學校設立外，也在全臺各地設置 14 個傳習所，傳習所針對不同年齡分為甲乙兩科教學，其中乙科即是公學校的前身，²⁸最初伊澤修二同甲午戰後的漢文教育改革家相仿，咸認為漢文導致清國退步，²⁹認為僅實施國語（日語）單一語言為臺灣教育方針即可。明治 28 年（1895）伊澤來臺遊歷後，親身驚愕於漢文傳播與溝通力量，僅用漢文筆談即可與臺灣住民進行溝通。³⁰再加上湯本武比古等日本學者疾呼漢文不可廢，³¹遂採取混合主義的方針，即以日語與漢文對譯方式教授，並以漢文為日本在臺灣推行國語教育的

²² 王俐茹：〈層遞與位移——日治初期臺灣文人身份變遷與《臺灣日日新報》〉，《第七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0 年 11 月），頁 129。

²³ 劉育英：〈贈別王君少濤赴任枋寮分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08 年 6 月 16 日）。

²⁴ 王少濤：〈贈潤庵君〉，《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8 年 11 月 20 日）。

²⁵ 黃守謙：〈贈寄園主人〉，《臺灣教育會雜誌》「文藝」欄（1916 年 9 月 1 日）。

²⁶ 蔡佩香：〈贈詞兄謝君汝銓〉，《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07 年 3 月 2 日）。

²⁷ 黃守謙：〈贈寄園主人〉，《臺灣教育會雜誌》「文藝」欄（1916 年 9 月 1 日）。

²⁸ 椿木益一：《臺灣大觀》，（東京：大阪屋號，1923 年），頁 196。

²⁹ 許時嘉：〈明治日本的漢詩文意識與殖民地統治——一個社會思想面的考察〉，《漢學研究》31 期，2013 年 9 月，頁 270。

³⁰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新北：群學出版社，2013 年 7 月），頁 6。

³¹ 許時嘉：〈明治日本的漢詩文意識與殖民地統治——一個社會思想面的考察〉，《漢學研究》31 期，2013 年 9 月，頁 270。



輔助手段。

明治 30 年（1897）年 10 月 31 日《國語傳習所規則中改正》特別規定於國語傳習所乙科課程中增設漢文課。明治 30（1897）年，伊澤再提出公學校的構想，預計將國語傳習所改成小學科六年、中學科四年的公學校學制，囿於經費不足，中學科始終無法成辦。在公學校中，除了保留臺灣塾教授的儒家經典外，也教授國語、地理、歷史、算術、科等學科，明治 31 年（1898）8 月 16 日正式頒布《臺灣公學校規則》，³²明白揭示公學校主要的目的即為培養具有基本讀寫能力且具愛國思想的新國民，³³以貫徹殖民政策。

國語傳習所的基本精神、機關設計及教學形態等均已具備近代學校的雛形。臺灣子弟「盈門桃李思沾化，渴望春風早返時。³⁴」地方士紳讓家族子弟就讀國語傳習所，向殖民統治當局表示輸誠，³⁵傳習所的國語教育有助於解除殖民統治者與臺灣社會之間的語言隔閡，畢業生可獲得就業及更多未來發展的機會，³⁶吸引更多漢人子弟加入。迄廢除國語傳習所，改設公學校，全臺灣共計成立傳習所、分教場 45 所。

4. 公學校制度初立

昭和 31 年（1898）將各個傳習所、分教場改制為公學校。自此初等教育制度大致奠定，公學校的課程除國語、自術、史地、理科智能科，也加設體育、音樂

³² 台灣通信社：《台北市史》（臺北：台灣通信社，1931 年），頁 422。

³³ 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臺北：群學出版社，2012 年 4 月），頁 53。

³⁴ 蔡添福：〈贈國語傳習所教授淺井先生東歸〉，《臺灣新報》第 5 版（1897 年 7 月 21 日）。

³⁵ 藍士博：〈從傳統文人、知識份子到印刷媒體世代——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知識社群的第三種詮釋〉，《第七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0 年 11 月），頁 168-174。

³⁶ 蔡秀美：〈日治初期臺中國語傳習所與地方社會〉，《國史館館刊》65 期，109 年 9 月，頁 19。



及藝能科，³⁷大抵以國語教育為主，為降低臺灣民眾反抗，亦將漢文視為教學科目之一。

各地公學校都聘請一至二位當地書房塾師或漢學詩人，如詩人林湘沅在臺北太平公學校³⁸、吳祥輝在頭圍公學校³⁹、黃贊鈞在大龍峒公學校⁴⁰……等，這些著名詩人皆曾擔任公學校雇員教師，最初將漢文併於讀書課中，每週長達 12 小時，最初就連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也必須學習漢文，⁴¹許多學童在漢文教師的教導下，也能熟通漢詩與文理，直到明治 34 年（1901）鑑於日本子弟回日本後無法銜接本土教育，方才停止。

俟明治 37 年（1904）3 月 11 日《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發布，將作文、讀書、習字等各教科一併納入國語課，漢文課獨立為一科，每週漢文改為 5 小時。明治 40 年（1907）2 月 26 日《公學校規則中改正》發布，五、六學年的漢文課授課時數，縮短為每週 4 小時，明治 44 年（1911）梁啟超受林獻堂之邀來臺，也曾參訪臺中公學校，親睹「所授何讀本，新編三字經。」當時仍施授漢文，只是教材為官方新編教材，與大陸地區傳統流通版本有所出入。

5.對於書房教育的打壓

日本在尚未明治維新前，受儒家影響深亦同臺灣實行書房教育，在塾房或塾院授儒家傳統經典，⁴²深知書房教育的模式。明治 30 年（1897）後，隨著臺灣反抗力量靖平，書房數量大增，許多傳統文人也希望「閩集詩編傳萬古，漢文課本

³⁷ 台灣通信社：《台北市史》（臺北：台灣通信社，1931），頁 422。

³⁸ 編輯部：〈詩星遽殞〉，《台南新報》第 1 版（1924 年 1 月 5 日）。

³⁹ 編輯部：〈頭圍登瀛吟社社長吳春麟先生逝世〉，《詩報》第 1 版，（1932 年 12 月 15 日）。

⁴⁰ 黃贊鈞：〈林母唐太孺人七秩壽序〉，《詩報》第 24 版（1942 年 11 月 10 日）。

⁴¹ 經典雜誌：《臺灣教育四百年》，（臺北：經典雜誌，2006 年 5 月），頁 81。

⁴² 片岡巖：《臺灣風俗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頁 175。



拓千秋。⁴³」也著手童蒙書籍編輯，如洪棄生《時勢三字經》、王石鵬《臺灣三字經》…佚名《臺明治分類雜字》……等⁴⁴，在當時蔚為風潮。

為因應此情勢，臺灣總督府也在同年（1897）10月發布《國語傳習所規則中改正》，於教授科目增加「漢文」一科，甚至增訂《三字經》、《孝經》、《大學》、《中庸》、《論語》等古籍教科書，當時的總督府學務部長，甚至曾審查、修改相關教科書，如伊澤修二所編纂的《增訂三字經》是刪去歌頌清朝的文字，也編纂《論語》。⁴⁵對臺灣實施日語教育的同時，也輔以儒學經典教育。

明治 31 年（1898）12 月總督府再頒布《書房義塾相關規程》，正式將書房納入教育體制內。在規程中除針對書房、義塾改良也對學徒言行、健康的注意，並規定書房義塾雖應漸次加設國語、算數等科目，使用總督府核准書籍作為教科書。⁴⁶此時國語教育混沌未明，民間通用仍是漢語。如國語傳習所乙科學童在畢業後，雖會使用日語，但仍存有不懂漢文句讀的窘境。

日治初期黃守謙為公學校教師到樹林訪友，也親見「田家自有樂，設塾訓兒童。⁴⁷」臺灣人仍是較願意將子弟送入傳統學塾與書房。總督府為了扳回公學校與書房的競爭劣勢，強迫書房同步採用學年制度，更聘任著名書房教師教授「漢文」，但仍然無法與挽回頹勢。彰化宿儒吳德功曾受臺中州彰化支廳長河東田義一郎之邀，出任臺中國語學校（今臺中教育大學）教師，〈贈河東田義一郎支廳長〉即言道：

⁴³ 張國珍：〈輓洪仁和先生〉，《詩報》第 20 版（1936 年 7 月 16 日）。

⁴⁴ 黃震南：《取書包，上學校：臺灣傳啟蒙教材》，（臺北：獨立作家出版社，2014 年 9 月）頁 28-29。

⁴⁵ 吳佩珍，〈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上（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 8 月），頁 249。

⁴⁶ 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1943），頁 90。

⁴⁷ 黃守謙：〈田家樂步樹林樵侶原韻〉，《臺灣教育會雜誌》94 號「文藝」欄，（1910 年 1 月 25 日）。



領袖青年會，命僕操教鞭。

國語思普及，勸誘徧市廛。⁴⁸

連大儒都必須放下身段，招募學子，當時民眾仍對於外族教育制度充滿懷疑，以致於入學者，多是日本政府效力的仕紳子弟。明治 35 年（1902）統計，全臺尚有書房 1,800 餘所，學生 3 萬 3,000 餘人。⁴⁹多數臺灣人仍是進入傳統書為主。

明治 35 年（1902）日本總督府曾有廢除全部書房的〈廢私塾論〉主張，然而如論中所言：「有公私之分學術難衷於一，致是以私學之廢，在舌耕之寒儒一時遽失生計，境況有極其困者。⁵⁰」一方面學校制度尚未建置完備再加上必須照顧塾師生計，各方籌算之下，並未驟然加以禁止書房教育。尤其在偏遠地區對於教育需求孔亟，更是無法遽然廢止，瀛社實業家詩人李建興曾於明治 42 年（1909）應地方父老之邀，於臺北平溪十分寮成安宮以「成德軒」之名設帳授徒，留有〈教學於成安宮〉：

教育集中第一聲，地方官長共歡迎，

新截桃李春風坐，轉瞬盈門百廿名。⁵¹

偏鄉地區教育資源不豐，為掌握受教的機會，鄉里人士紛紛將家中子弟送至成德軒，除了 120 名男童，亦有 10 名女童。在偏鄉地區學校未普及前，也僅有書房教育一途。

許多家長把公學校視為「蕃書房」心態，仍維持半耕半讀的書房模式，使得

⁴⁸ 吳德功：《瑞桃齋詩稿》（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 年 5 月），頁 220。

⁴⁹ 椿書木益一：《臺灣大觀》，（東京：大阪屋號，1923 年），頁 207。

⁵⁰ 謝崇耀：《百年風華新視野：日治時期臺灣漢文學及文化論集》，（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9 年 12 月），頁 47。

⁵¹ 李建興：《紹唐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頁 24。



公學校學生出席率不佳，據統計明治 38 年（1905）公學校出席率僅 61.81%，明治 39（1906）公學校僅男童輟學曾高達 35%，⁵²公學校認為書房搶了臺灣學生，此際已陸續有廢除書房之議，明治 39 年（1906）〈處置私塾〉云：「本島之新舊學界，互爭消長，故舊學長而新學消，舊學消而新學長。理有必然，而勢所必至也。新學之勢力在於公學校，而舊勢力，在於私塾也。」⁵³1910 年代實行「改良書房」，學科、教科書均比照公學校，接受政府補助，令書房漸次減少。

（二）大正時期

日治時期的教育政策經過明治時代的撞擊與試驗，大抵在大正時期確立，許多教育政策由此時期頒定。除了依舊對書房漢學教育施壓，也因為中高等教育不足形成臺灣赴日的留學生，再加上持續以國語教育為主，造成書房教育與學校教育的此消彼長。

1. 持續對漢文教育打壓

大正初期公學校數量更多，為了令國語教育能更加深加廣，大正元年（1912）11 月 28 日《公學校規則中改正》發布，三、四學年的漢文受課時數，由每週 5 小時縮短為 4 小時，壓縮漢文教學時間。時值新學發展的時期，大眾普遍認為新學有益物質條件的改善，因此不以為意，臺灣民眾亦不反抗。

大正初期大致延襲明治時期的改良書房政策，隨著時間日久書房漸失優勢，學生已漸流失至公學校，大正 5 年（1916）書房數為 584 所，學童約 2 萬名就學。

⁵² 經典雜誌：《臺灣教育四百年》，（臺北：經典雜誌，2006 年 5 月），頁 82。

⁵³ 謝崇耀：《百年風華新視野：日治時期臺灣漢文學及文化論集》，（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9 年 12 月），頁 29。



⁵⁴大正 8 年（1919）殖民地把臺灣的統治方針改成內地延長主義，公布第 1 次臺灣教育令，其中將臺灣視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著重把臺灣人教化成日本臣民。⁵⁵據大正 10 年（1921）統計，書房數僅達 197 所，學生也減至剩下 7,000 位左右。⁵⁶，5 年內減少幅度高達 2/3，公學校成為臺灣民眾教育的主流。

此際詩歌多歌頌新學的好處，如蔡啟華「東西新學如雲起，恨不遲生三十年。⁵⁷」、「英才誇鳳起，新學羨鵬搏。⁵⁸」，當時「學校養成新學問，漫云中幘遜鬚眉。⁵⁹」女性也是國民，自然也可以入學，就學率亦有日漸上升之趨勢。大正 7 年（1918）3 月 31 日《公學校規則中改正》更縮短漢文為每週 2 小時。「國語風俗如枝葉，詹炎斯言大正理。⁶⁰」學校漢文教育也就如溫水煮青蛙的方式，自公學校的體制中漸漸消失。

2. 中高等學校不足造成留學生

大正年間起，臺灣社會對新式教育的需求極高，除了有改良式書房傳授新式教育，地方人士也願意捐資興學辦學校，在公學校普設之際，臺灣要到大正 4 年（1915）方有全臺第一所中等教育機構——臺中中學（今臺中一中）建立，大正 10 年（1921），臺灣人口約為 350 萬，公學校學生有 15 萬 9,542 人，中學僅有寥寥數所，升學之路狹窄可想而知。

⁵⁴ 椿書木益一：《臺灣大觀》，（東京：大阪屋號，1923 年），頁 207。

⁵⁵ 飯尾由貴子撰、唐顯芸譯：〈陳進的女性形象地方色彩——以一九三〇年代的作品為中心〉，《中心到邊陲的重軌分軌：日本帝國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年 6 月），頁 319。

⁵⁶ 椿書木益一：《臺灣大觀》，（東京：大阪屋號，1923 年），頁 207。

⁵⁷ 蔡啟華：〈感遇〉，《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08 年 11 月 11 日）。

⁵⁸ 蔡啟華：〈送岡本先生任旭瀛院長〉，《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3 年 12 月 19 日）。

⁵⁹ 陳錫金：〈鰲峰竹枝詞〉，《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7 年 4 月 21 日）。

⁶⁰ 漁村氏：〈臺灣新制頌〉，《臺灣時報》第 126 版（1920 年 10 月 1 日）。



眼見臺灣島內就學不易，許多家長「愛兒新學印頭顱，不憚尋師就遠途。⁶¹」為了能讓子女升學僅有海外留學一途，甚至連瀛社詩人林幼春也順著「環球智識日求新，恥作轅駒老此身。⁶²」的潮流至日本留學，當時日本政府為了安頓臺灣去的留學生，也特別設置「高砂寮」安置，魏清德〈觀高砂寮有懷留學諸子〉：

攻學東都大有人，高砂寮裡別慈親。

乃知款段騎行輩，誰識人間有苦辛。⁶³

東亞華人圈崇尚高學歷，百年前已成風，多以至日本留學為主。「官階指日盼高遷，留學還從早稻田。⁶⁴」傳統士大夫望子成龍的觀念一直根深蒂固，在日治中期已不少人遠赴海外接受新式教育，到了內臺同一後更增加，如大正 4 年（1915）臺灣總督府在東京小石川區設立留學宿舍——高砂寮，僅有 300 餘名臺灣留學生，大正 11 年（1922）暴增至 2,400 餘名，⁶⁵可見臺灣教育資源缺乏。

3.以國語為主的教育體制

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風潮興起，臺灣亦開展「內地延長主義」，因應局勢，預計實施內臺共學制，乍聽之下以為德政，許多詩人以為「兒童共學兮化育功，況頒新制兮母國同。⁶⁶」、「文德彬彬共學昌，伏莽狂榛舜堯化。⁶⁷」、「振奮鄉閭文化開，小公學校育英才⁶⁸。」從此達到臺日平等。

待大正 11 年（1922）正式頒布《新臺灣教育令》，初等學校依據常用國與否，

⁶¹ 倪希昶：〈送洪以南君攜令郎赴內地留學〉，《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07 年 4 月 16 日）。

⁶² 傅錫祺：〈再次癡仙韻，送仲衡遊東京〉，《櫟社第一集鶴亭詩草》，（臺中：博文社，1924 年 2 月），頁 1。

⁶³ 魏清德：〈觀高砂寮有懷留學諸子〉，《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3 年 5 月 24 日）。

⁶⁴ 陳錫金：〈贈蔡伯毅先生〉，《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22 年 11 月 7 日）。

⁶⁵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1991 年 3 月），頁 4。

⁶⁶ 蕭榮耀：〈灣新制頌〉，《台灣時報》（1920 年 10 月 1 日）。

⁶⁷ 澤谷星橋：〈灣新制頌〉，《台灣時報》（1920 年 10 月 1 日）。

⁶⁸ 醉嘯：〈金瓜石金山枝詞〉，《詩報》第 16 版（1935 年 9 月 1 日）。



決定孩童就讀小公學校，不再以臺日民族區別。因應內臺共學，將所有漢文課改為每週 2 小時的「隨意科」（即選修），並得視地方情勢，廢除漢文課。內臺同一的政策實施後，升學更重視國語成績，造成臺灣子弟先天上的不平等。

根據《臺灣總督府等學校規則》（1922 年府令 84 號）第 36 條有關入學規定中，明定「尋常科第一學年入學志願者人數，超過定額之時，依照常小學校畢業程度進行選拔」，⁶⁹校方參照小學校教科書內容出題，所有科目臺日籍學生大致相仿，但公小學校所教授的國語難易有別，小學校多為日籍學童且為母語，故課程較深，⁷⁰以小學校的教科書出題，無異對臺籍學童成為升學壁壘。

4. 書房學校此消彼長的確立

大正 11 年（1922）制定《私立學校規則》統一管理，將書房納入官方教育管理體系，⁷¹當時還規定教師須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並通曉國語者，且規定施教場所須有運動場及廁池等，⁷²導致一些寺廟附設的傳統書房因無法符合規定而停止授徒。

書房與學校在大正期間此消彼長，當時也有許多詩社或家長為了不令子弟全然受日本式教育，也聘請漢文西席教授漢文，如汐止公學校同窗會即設立文庫及夜學會⁷³、澎湖馬公街漢文夜學諸青年也組織小瀛吟社。⁷⁴臺灣文化協會也曾在大正 13（1924）年 1 至 4 月邀請連雅堂在臺北開設高等漢文講習會，⁷⁵教育臺灣青年傳統文學，然仍不敵新式教育的浪潮。

⁶⁹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師範大學，2012 年 10 月）頁 143-144。

⁷⁰ 劉家水：〈民選自治實施學校名目均一教育一律論〉，《台南新報》第 8 版（1933 年 9 月 8 日）。

⁷¹ 大臺灣救濟團：《佐久間久馬太》，（臺北：臺灣救濟團，1933 年），頁 179。

⁷² 計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記——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4 年 7 月），頁 182-183。

⁷³ 編輯部：〈創設吟社〉，《台南新報》第 4 版（1926 年 12 月 23 日）。

⁷⁴ 編輯部：〈澎湖馬公街漢文夜學諸青年近組織小瀛吟社〉，《台南新報》第 6 版（1926 年 11 月 30 日）。

⁷⁵ 戴月芳：《臺灣文化協會》，（臺中：莎士比亞文化，2007 年 12 月），頁 26。



新式學校經過多年的推動已擴展至全臺灣各地區，初等教育學校增加但中學教育卻未與時並進，「共學實施無畛域，合群自治見天真。⁷⁶」是對當時最大的反諷，不公的環境且國語決定升學的壓力，雖無明禁學校漢文教育，當時全臺灣 625 所公學校僅有 37 所（臺北州 13 校、臺中州 24 校）所將「漢文科」訂為選修科目，僅佔全臺 5.8%，⁷⁷學校無漢文課程，自然不願再聘請漢文教師，漢文也就自然由正規教育體系排除。

隨著新式教育普及，新的地方士紳出現，他們或為學生家長，甚至是畢業校友，關懷地方教育與學校關係密切，臺灣人民的集會地點也漸漸從原來的廟埕轉移至學校內。從大正時期漢詩的寫作題目觀之，對象有許多是日本籍教師，當時的師弟關係十分融洽，如張四正〈呈謝左營第一公學校諸先生〉：

螢窗六載把書攻，卻喜師恩似孔融。

指導不嫌才碌碌，得教化雨坐春風。⁷⁸

從詩中可見當時弟子對於受業師的感恩，大正時典臺灣能受教者不多，公學校所教授的學業已足以應徵求職，應付許多日常工作。日本守時、講求團體紀律與年功資職位制的會社制度，亦在臺灣實施，無形影響臺灣人的工作精神與生活態度。

（三）昭和時期

經過 30 年於全臺灣南北普設公學校，仍是供不應求。到了大正 14 年（1925），臺灣學齡兒童就學率仍達不到 30%，女童甚至僅達 12.5%，許多想入學的兒童因為公學校收容人數不足，而法入學。由於學校機構有限，當局意識到「國民普及

⁷⁶ 陳書：〈新制頌〉，《台灣時報》第 124 版（1920 年 10 月 1 日）。

⁷⁷ 河原功：《被擺布的臺灣文學：審查抵抗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 年 11 月），頁 250。

⁷⁸ 張四正：〈呈謝左營第一公學校諸先生〉，《台南新報》第 5 版（1924 年 5 月 16 日）。



貴文章。⁷⁹」，也開始對針對民間國語教育著手，待皇民化興起，國民教育亦開始實施。

1. 民間國語教育

日治時期的國民教育政策在大正時期大抵已經建置完成，各級小公學校座落於臺灣南北的山巔海崖。在昭和時代最重要即是國語教育的貫徹，可以從民間普設的講習所、底層的藝妯及偏遠地區的原住民，進行日治時期國語實施的成效的考查。

(1) 講習所

昭和 6 年（1931）3 月公布《國語講習所要項》，各地方開始普設講習所，如民雄庄講習所於昭和 7（1932）首創於民雄；次年則在牛稠溪、陳厝寮和社溝設置，後逐漸普及於各個村落。⁸⁰講習所上課期間為一年，招收年齡為 11 至 20 歲者。每年上課百日以上，每日上課為 2 至 3 小時，⁸¹講習所開設種類多元有國語講習所 5,364 個、特設國語 637 個、簡易國語 10,864 個、（延）幼兒國語所 1,638 個，參與人數歷年增加，至昭和 16 年（1941）4 月已達近 80 萬人，能通國語者達 57.02%。⁸²成為體制教育之外的國語政策推手。

當時的國語教育推動，由上而下，民間響應者亦眾，商工會議組織章程第十一條即明定：「會議中僅能使用國語。⁸³」民間也主動在下班後組織夜學會，聘請師資教授國語。相關的講習所、練習會、普及會……等國語教授的塾校，更是如

⁷⁹ 楊石定：〈贈漳興會國語講習所〉，《詩報》第 12 版（1937 年 6 月 25 日）。

⁸⁰ 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究》8 期，2001 年 10 月，頁 27。

⁸¹ 遠藤所六：《臺中市史》，（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頁 657-658。

⁸² 臺灣總督府：《臺灣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1943），頁 129。

⁸³ 太田肥洲：《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 年 6 月），頁 137。



兩後般開設。國語教法大抵「國語初傳只簡單，老少無拘同勉勵，愛他問答莫為難。」、「宣講全憑一句初，簡明國語藉新書。⁸⁴」以簡單日常對話為主，除國語教學，也講授公民、體操和唱歌等項目，以圖振奮課堂精神。

(2)自修途徑

1930 年代臺灣識讀率已能支持 320 萬印刷出版人口，⁸⁵全臺書店日文圖書、雜誌進口、刊行亦眾多，有些出版商也來臺設立分支機構。⁸⁶日本各大書店也在《臺灣日日新報》等大眾傳媒刊登廣告，刺激民眾購書，當時日文書刊在店面陳列，再加上圖書館、讀報社、讀書會等公共設施或同人團體的設置，也有助於國語的學習。

當時印刷、出版業盛行，臺灣最大的書店——新高堂，為了容易更多臺灣人學習也邀請名家編印專書，如劉克明《國語對譯臺語大成》（1916）、藤井常登《臺灣教育國語必攜》（1920）、杉房木助《日臺會話大全》（1926）……等，⁸⁷都是當時自學讀本。為了使民眾更能簡易了解，也有利用假名與漢文參照，輔以圖片的《新編繪圖國語初步》，⁸⁸教導臺灣民眾學習初步日語，使臺灣自修國語人口日增，僅大正 9 年（1920）至昭和 5 年（1930）的 10 年間，諳國語者即呈現 3.6 倍的增加幅度，⁸⁹國語教育推動十分成功。

⁸⁴ 陳鏡如：〈為新竹驛前國語練習會講師感作〉，《詩報》第 19 版（1938 年 8 月 4 日）。

⁸⁵ 蘇碩斌：〈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聚焦臺灣：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年 6 月）頁 77。

⁸⁶ 劉庭彰：〈日治時期中、日書畫學文本在臺的流動與轉載——以《風月》（1935-1936）為觀察對象〉，《臺灣文學場域的生成與典律反思——第十二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6 年 3 月），頁 450。

⁸⁷ 蔡盛琦：〈新高堂書店：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12 期，2003 年 12 月，頁 40-41。

⁸⁸ 臺北周協隆書店：《新編繪圖國語初步》，（臺北：臺北周協隆書店，1936 年），頁 1-25。

⁸⁹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府，1933 年），頁 45-46。



經過官方一連串的推動與民眾自學，民眾大致「解些國語漸通流。⁹⁰」、「漢文看罷和文繼。⁹¹」在和漢語中自由聽說或閱讀。原先 1930 年代前期許多地方依然「國語普通理半解。⁹²」經過幾年的推廣，索心聲〈龍目井所見〉「家家國語皇民化。男女同歌月下談。⁹³」、楊爾材〈宿馬公雜詠〉「翩翩士女盡時妝。國語家家各擅長。⁹⁴」地方上都能夠稍解國語，這種力量影響甚廣，以致「近來國語催進力已遍全台，連舊時子曰店主亦公然轉向。⁹⁵」連有些持守漢文教育的書房塾師也不得不學習國語，以順應潮流。

(3) 藝妯與國語學習

隨著教育的普及，已有不少由公學校畢業藝妯執業，這些受過教育的藝妯能歌善舞且能以流利的日語與日本政要溝通，席間多了許多會日語的藝妯，更添風情。日治時期為了令國語更流通，例如臺南市於昭和 9 年（1934）年辦理市內藝妯國語講習，教導藝妯學習國語，⁹⁶成績優良者亦可受市尹等高層官員表揚。

昭和 10 年（1935）10 月總督府準備於臺北舉辦「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為了令節目內容更佳精湛，自 9 月起也安排藝妯在南方館，排練流行歌劇及舞蹈，準備在展覽會時一展才藝。精挑細選下來，「稻江花檢藝妯全部百名，其中三分之一，能操國語。⁹⁷」由此看來，當時藝妯除了容貌佳、琴藝通、善交際，更要能說日語。「國語流通又漢文，無他學問羨精勤。⁹⁸」只要能時常精熟練習，

⁹⁰ 許慶同：〈述懷〉，《風月報》第 28 版（1941 年 1 月 19 日）。

⁹¹ 吳詠元：〈觀書〉，《詩報》第 5 版（1938 年 8 月 4 日）。

⁹² 陳然：〈讀湖西庄協議會議案偶成〉，《台南新報》第 8 版（1933 年 12 月 19 日）。

⁹³ 索心聲：〈龍目井所見〉，《詩報》第 19 版（1938 年 11 月 3 日）。

⁹⁴ 楊爾材：〈宿馬公雜詠〉，《詩報》第 2 版（1943 年 6 月 7 日）。

⁹⁵ 鄭坤五：〈闕題〉，《詩報》第 26 版（1941 年 7 月 22 日）。

⁹⁶ 編輯部：〈翰墨林〉，《台南新報》第 8 版（1934 年 5 月 13 日）。

⁹⁷ 編輯部：〈北里燕脂譜〉，《風月報》第 2 版（1935 年 9 月 6 日）。

⁹⁸ 笑虎、家駒、君山〈贈尚美校書〉，《詩報》第 9 版（1941 年 3 月 2 日）。



語言學習並非難事。

當時大稻埕的文人籌辦《風月報》，即刊載「藝妓小傳」，內容多述說其芳齡、生平、嗜好、才藝……等，以供讀者參考。這些藝妓雖出身青樓，然多才多藝，例如：「文字能邦語，且善猜拳飲酒。⁹⁹」的寶猜、「最是和漢兩學俱通，邦語流暢。¹⁰⁰」的阿敏、「邦語流暢，工拳酒，善解頤。¹⁰¹」的絹子……等人都是當時紅牌藝妓。這些藝妓的基本條件即是「能將國語作歡談。¹⁰²」，除藝姐外，女給也是「生涯酒肆學西歐，國語流通待客柔。¹⁰³」能識讀日語、閱歷豐富，自然客源就能拓展，¹⁰⁴就能如同廖泗風〈席上呈稻江蘭枝校書〉所言：

能通國語又能詩，彭彭金蓮步履時。

迷倒樽前老遊客，稻江冶豔說蘭枝。¹⁰⁵

江蘭枝是稻江一帶有名的藝妓，不僅會說日語又能寫詩，身材曼妙又長袖善舞，讓無數火山孝子自願拜在石榴裙下。隨著國語普及，「由某校畢業者，國語流暢，善飲能唱。」的藝姐更為增多，可見得美色僅是標準配備，更多的是藉由國語襯托下的外在談吐與內在涵養。

(4) 原住民與國語學習

日治時期「蕃語聽難慣¹⁰⁶。」原漢衝突亦是不斷上演。玉井事件結束後，漢

⁹⁹ 南村生：〈寶猜〉，《風月報》第 4 版（1935 年 9 月 23 日）。

¹⁰⁰ 晴雨：〈阿敏〉，《風月報》第 4 版（1935 年 10 月 26 日）。

¹⁰¹ 林華：〈絹子〉，《風月報》第 4 版（1936 年 2 月 8 日）。

¹⁰² 夢鶴〈贈愛子〉，《詩報》第 15 版（1939 年 9 月 17 日）。

¹⁰³ 謝梅仙：〈女給〉，《詩報》第 20 版（1942 年 7 月 24 日）。

¹⁰⁴ 簡荷生：〈旅中隨筆〉，《風月報》第 17 版（1939 年 7 月 7 日）。

¹⁰⁵ 廖泗風：〈席上呈稻江蘭枝校書〉，《詩報》第 9 版（1942 年 12 月 7 日）。

¹⁰⁶ 黃欣：〈東臺灣雜詩：出水坡〉，《專賣通信》第 9 卷第 4 號（1930 年 4 月 15 日）。



人對殖民政府反抗業已平息，第 5 任總督佐久間馬太開始籌畫大規模的山地撫蕃，征服後即設置山地警察以為監視。林述三〈共進會竹枝詞就純甫兄題〉即描寫漢人與新竹泰雅族原住民交易的情景：

黑赤蕃人不著衫，啁啾蕃語似呢喃。
成群愛買花紅布，特派蕃山警察監。¹⁰⁷

日本政府不僅設駐在所，更設國語演習所教育原住民。然而，初期仍然反叛無常，以臺中和平地區泰雅族為例，大正 9（1920）年即發生白冷事件、梨山事件、遠藤事件等重大抗日活動，造成重大傷亡。¹⁰⁸也因為缺乏交流而令平地人所懼怕。日本畫家鄉原古統即曾經「今年涉險入蕃山，抽毫繪入銀光楮¹⁰⁹。」只為親歷持樂樂瀑布寫生，而不畏生命安危。

隨著局勢安定，總督府也在原住民部落廣設演習所，演習所的建立不僅提供知識，也取代原有的會所成為集會地點，國語的傳入也改變傳統習俗，原住民不再馘首為功，反而以擅說國語為榮，例如潮州群巴容社與瓦卡巴社即以國語練習會之類的活動，來矯正部落的傳統祭儀。¹¹⁰一連串的國語比賽，也令國語識讀率也大為提升，¹¹¹有助於外界溝通。

日本人旅臺，也時常將沿途遇原住民聽說國語寫入作品，如昭和 10 年（1935）家野上彌生子因臺灣博覽會訪臺，進行環島旅行，即將達泰雅族的巴達岡部落（今

¹⁰⁷ 林述三〈共進會竹枝詞就純甫兄題〉，《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6 年 5 月 12 日）。

¹⁰⁸ 鄭安晞：《願社平和：臺中和平地區原住民聚落》，（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8 年），頁 74-80。

¹⁰⁹ 王少濤：〈古統畫伯特樂樂瀑布圖見贈繫之以詩〉，《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1927 年 2 月 11 日）。

¹¹⁰ 張耀宗：〈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族國語演習會〉，《市北教育學刊》44 期，2014 年 10 月，頁 39。

¹¹¹ 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東京：國史刊行會，1930），頁 872-874。



錐麓古道)善日語的族人寫入作品中，¹¹²成為日人遊臺的回憶之一。

由於部落漸趨平和，有阿里山鐵道經過的鄒族原住民自然成為家喻戶曉的象徵族群。梁盛文於昭和 6 年（1931）乘車上山暫停十字路車站時，留下〈余己已九月遊阿里山於途中所見綴成十首以誌鴻泥〉中，描寫鄒族原住民與遊客互動：

十字路中交易場，幾多蕃女髮披裳。

土官皮帽羽雙插，腰繫螺珠白有芒。¹¹³

詩中對原住民裝扮鉅細靡遺，可見當時鄒族原住民與遊客互動熱絡，平地人也能與原住民近距離接觸、日治時期許多原住民會把握火車停站的短暫時間，持地方山產與車廂中的旅客交易，大賺觀光財。

在登山火車行進間「仰見林間公學校。¹¹⁴」，國語也帶進了部落也將此地輔導為模範蕃社，每當日本皇族至阿里山旅遊，定在此大張旗鼓辦理奉迎拜謁儀式，讓皇族與這些可以操流利日語的原住民對談，¹¹⁵，展現教化成果。透過各地山地警察進駐與國語教育推行，也歸服了臺灣原住民。例如南澳的泰雅族「甚且逢人多禮貌，善操國語最堪聽。¹¹⁶」、臺東的阿美族「門外招徠多顧客，歡談國語雜蕃音。¹¹⁷」，林佛國〈關西雜詠寄呈子春〉，描寫了新竹關西馬武督地區原住民的和善：

¹¹² 安田敏朗著、黃耀進、林琪禎譯：《「他們」的日本言：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かれらの暁語：台湾「残留」日本語論〕》，（新北：群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27。

¹¹³ 梁盛文：〈余己已九月遊阿里山於途中所見綴成十首以誌鴻泥〉，《詩報》4 期，1931 年 1 月 17 日，頁 2。

¹¹⁴ 蘇友章：〈阿里山遊草〉，《台南新報》第 8 版（1933 年 12 月 5 日）。

¹¹⁵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臺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臺北：玉山社，2014 年 5 月），頁 168。

¹¹⁶ 林玉麟：〈南澳記遊〉，《詩報》第 11 版（1944 年 3 月 1 日）。

¹¹⁷ 玉鳴東：〈臺東竹枝詞有引〉，《風月報》第 29 版（1938 年 5 月 1 日）。



逐隊蕃人輓稻車，逢人揖禮似知書。

試操邦語為勞問，猶復殷勤笑謝余。¹¹⁸

國語的普及增加島上各族群間彼此能直接溝通與交流，減少不必要的摩擦的發生，不再徒增傷亡。令原本視為畏途的山地美景呈現在世人面前，也藉由傳統文化行銷其物產，利市大發。自此「峰巒遠帶新晴色，蕃語高歌樂歲聲。¹¹⁹」享有更好的物質生活，減少無謂的殺伐與生命財產損失。

2. 皇民化時期

昭和 12 年（1937）即有許多日本學者，如國府種武在〈臺灣に於ける國語普及上の諸觀點〉鼓催臺灣國語普及的重要性。¹²⁰皇民化實施後，當局更體認「皇民化之第一步，在使用國語，進而學習國文(和文也)。¹²¹」國語學習的風氣更是興盛至全臺各地，「島民灌注大和魂。國語宜先會得言。¹²²」在皇民化之際更是再三強調國語與國民間的重要關係，為實施皇民化，連最後的臺灣僅存的 9 家漢文書房也遭禁止，政策實施至全島後，「三家也禁漢書房。¹²³」就連教育不普及的偏鄉農村亦不放過。薛玉田〈解館書懷〉：

舊學薪傳等暮雲，淪亡吾道寂無聞。

殘書又見焚秦火，一令偏從廢漢文。¹²⁴

道盡一輩子在硯田鑽研、教育地方子弟知識分子的悲哀。昭和 14 年（1939）隨著

¹¹⁸ 林佛國：〈關西雜詠寄呈子春〉，《南方》第 30 版（1941 年 9 月 1 日）。

¹¹⁹ 簡先源：〈遊日月潭路上即景〉，《詩報》第 7 版（1931 年 1 月 17 日）。

¹²⁰ 國府種武：〈臺灣に於ける國語普及上の諸觀點〉，《臺灣時報》第 1-2 版（1937 年 2 月 1 日）。

¹²¹ 鄭坤五：〈墨戲〉，《詩報》第 23 版（1938 年 8 月 4 日）。

¹²² 劉氏環：〈皇民塾〉，《詩報》第 3 版（1942 年 1 月 20 日）。

¹²³ 鄭鷹秋：〈農村〉，《詩報》第 5 版（1937 年 1 月 17 日）。

¹²⁴ 薛玉田：〈解館書懷〉，《詩報》第 11 版（1937 年 8 月 1 日）。



戰局持久，考慮將來動員臺灣人應戰，總督府召開臨時調查會決定實施六年義務教育，為因應軍事動員，昭和 18 年（1941）總督府實行義務教育，並且頒布《廢止私塾令》禁止學校外的教育，¹²⁵「國民基礎冀完成，公小無分一樣名。¹²⁶」將全國小公學校全改稱國民學校，「遍閱街庄公小校，國民看板並高抬。¹²⁷」此刻臺灣人的心情應當是十分澎湃，終於被視為國民。如同倪希昶〈國民學校改稱有賦〉：

旭日同光大弟兄，誰人不是國干城。

儲材有用昌邦本，好備乘時共請纓。¹²⁸

昭和 18 年(1943)接受初教育的臺灣兒童已達 79 萬人，昭和 19 年（1944）全臺共有千餘所初等教育機構，受教人數更達 87 萬餘人。然而「國民」兩字必須由臺灣民眾生命犧牲來換取，國民學校以鍛鍊戰士為主，「五十音翻千萬語，和文傳誦漢文藏。¹²⁹」、「漢文零落和文振，億載扶桑富士山。¹³⁰」國語流利與否代表了對國家是否效忠。

隨著戰事吃緊，「誰謂殖民難向上。懷為糾糾有群英。¹³¹」日本政府也對臺灣開啟志願兵召集，志願兵亦除了身體健康與志願外，更要國民學校畢業¹³²且擅國語，¹³³透過文化教育政策的提高日語臺灣社會的能見度，令臺灣人徹底忘失民族精神。

¹²⁵ 五味田忠：《臺灣年鑑》，（臺北：臺灣通信社，1943 年），頁 255-256。

¹²⁶ 劉克明：〈國民學校改稱有賦〉，《臺灣教育》「漢詩」欄（1941 年 6 月 1 日）。

¹²⁷ 顏笏山：〈國民學校改稱有賦〉，《臺灣教育》「漢詩」欄（1941 年 6 月 1 日）。

¹²⁸ 倪希昶：〈國民學校改稱有賦〉，《臺灣教育》「漢詩」欄（1941 年 6 月 1 日）。

¹²⁹ 潘春源：〈讀書聲〉，《詩報》第 15 版（1942 年 2 月 20 日）。

¹³⁰ 陳寄生：〈儒峰頌〉，《詩報》第 16 版（1941 年 5 月 19 日）。

¹³¹ 黃森峰：〈志願兵〉，《詩報》第 112 版（1941 年 8 月 2 日）。

¹³² 黎振君：《客庄生活影像故事 3—凝視頭份·張阿祥》（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2012 年 1 月），頁 122。

¹³³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編輯部：《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準備讀本》，（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3 年）頁 175-201。



三、臺灣民眾對國語的心態

臺灣人在改隸初，對於即將來的語文浪潮，仍無所悉。隨著國語教育實施後，一連串風俗制度改革，使得日語凌駕漢文，受過新式教育的雙語世代逐漸掌握話語權，也積極將國語或相關新知傳播予農村青年，使得國語不再僅是溝通的功能，相較於漢文，更是進步的象徵，也影響民眾對國語的學習態度。

(一) 明治時期

自明鄭開臺以來，書房即是知識傳播的場所，書院學習制舉，以求功名利祿，偶作聯句或詩詞自娛。就如同葉石濤於《臺灣文學史綱》所說：「臺灣三百年來舊文學是士大夫階級的獨佔物，一般大眾是無緣的。¹³⁴」由於能通文句、識句讀，被視為知識分子，掌握文字的力量，成為士紳。在日治初期漢文是島上主流文字，日本派駐臺灣的官員還必須勤習漢文，甚至定有講義以利官員學習，在臺任職官僚亦多能吟詠，吳德功〈送岡本忠平高等通譯官〉：

翻瀾妙舌慧天開，榮寵高官早錫來。

土語方言皆諳悉，差同倚相號多才。¹³⁵

從詩中可知日本通譯官不僅通漢文且諳臺語，無須書寫即能與臺灣士紳進行直接溝通。日本政府籠絡士紳詩人不遺餘力，為迅速統治臺灣，皆加以任用。如李種玉、張元榮、簡朗山……等都曾任職於保良局，待臺灣平定後再授與官職或紳章，除少數因堅持民族氣節者不仕外，大致都能政府職務或專賣權實質獎勵，改隸初期社會階層流動並不甚劇烈。

¹³⁴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年9月），頁40。

¹³⁵ 吳德功：《瑞桃齋詩稿》（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年5月），頁189。



由於漢字臺日共通且來臺官員亦閑熟漢詩，以推廣漢詩為治臺策略，獎勵臺人結詩社，擊鉢吟盛極一時，¹³⁶日籍官員常赴會與臺灣詩人和樂融融。到了兒玉源太郎執政總督府，更為積極，除邀請詩人至「南菜園」官邸開吟詩大會，也積極辦理饗老典和揚文會，¹³⁷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在官邸書房「鳥松閣」召集詩會，以懷柔籠絡士紳階級，¹³⁸此風氣也延續至日治中期不輟。

日本新式學校建立後，也邀請碩師彥儒至學校教授漢文，學校也成為孕育臺灣詩人的搖籃。就如同賴和在《南音》創刊號發表〈歸家〉所說：「學校不是單單學講話、識字，也要涵養國民性……。」這些受過殖民教育的雙語學歷菁英世代，文化資本在改隸之前僅為傳統知識分子所獨佔，日本政府利用教育的方式，令文化資本流動至雙語世代。

此際臺灣的士紳階層雖然送子弟接受現代化教育，但也保持著對傳統書房教育的支持，紛紛送弟子至詩社學習，以學會漢文或參詩會以獲致詩人美名，有些家長為了免子弟流連煙花場所，鼓勵其子弟參與詩文活動。遇日本長官有吟詠雅興也可共歡¹³⁹，成為晉身的臺階。

這些雙語世代也不再緊抱舊思維，反而懷抱著「更崇歐美新學派，參以和漢舊思瀾。¹⁴⁰」兼融東西，劃分出傳統士紳階級知識分子與一般被殖民臺灣人的差異界線，獲得新學的實用性，迅速取代原先書院儒生的士紳地位，成為臺灣社會

¹³⁶ 廖一瑾：《臺灣古典詩選、詩集、詩社與詩人》，（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年9月），頁77。

¹³⁷ 許時嘉：〈〈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臺灣史研究》20期（102年12月），頁197。

¹³⁸ 張毅鈞：《臺灣詩與詩社》，（臺中：莎士比亞文化事業，2007年2月），頁21。

¹³⁹ 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年7月），頁215-216。

¹⁴⁰ 魏清德：〈三月二十二日吾竹周君貢南鄭君維乞訪余客邸云將遊學東都鄭君大明王君原吉亦將偕往謹賦此言別〉，《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2年3月26日）。



的領導者，例如草屯的洪元煌等人即在南投草屯組織炎峰青年會教導農村青年日語。¹⁴¹一般都將受新式學校教育的詩人稱作新學派，而將原先書房出身者稱為舊學派。據統計在明治末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已有 52% 受過新式教育，新舊學領導者旗鼓相當，此時倒也能夠相安。

（二）大正時期

自明治領臺即從事慣習調查，即以強調改善衛生與醫療為先。臺灣知識分子也知曉其重要，領導者大稻埕中醫師黃玉階本身即是詩人，號召文友一同參與，使傳統知識分子們成為移風改俗的先驅，率先主動提出剪辮、解纏足、戒鴉片的陋習改革，成效十分顯著在大正後期臺灣社會已少有留辮男性與纏足女生。顏笏山〈斷髮有感〉：

文明時進步，人世幾滄桑。

蕞爾星星髮，奚須較短長。¹⁴²

明治維新後，脫亞入歐成功的日本被視為世界強權之一，更把斷髮、西服視為進步的象徵，在新學高漲與舊學衰頹更易之際，舊傳統知識分子已略感危機意識，如王石鵬〈敬題友竹宗兄授經圖〉：

新舊學說異而同，參稽互證括西東。

東學雖衰西學盛，哲理由來可貫通。¹⁴³

雖然舊學派詩人仍然認為新舊學只是舊學的延伸，大凡東西學都有其理可通。甚

¹⁴¹ 陳文松：〈日治時期臺灣「雙語學歷菁英世代」及其政治實踐：以草屯洪姓一族為例〉，《臺灣史研究》4期（2011年12月），頁60-70。

¹⁴² 顏笏山：〈斷髮有感〉，《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3年5月14日）。

¹⁴³ 王石鵬：〈敬題友竹宗兄授經圖〉，《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6年5月24日）。



至也有人認為「方今新學正東漸，韻事還須舊學兼。¹⁴⁴」漢詩仍然可以安然長存。

當時不願學習日文，並不影響仕途，因為傳統科層組織下，取得士紳對政權效忠，保甲工作即能順利成辦，更勝擁兵千萬。就如同桃園街長簡朗山（祝始政二十年紀念雜感）道出心聲：

廿載桃園感廢興，一鄉領袖愧尊稱。

年來徒作狂吟客，國語而今嘆未能。¹⁴⁵

由於他們身處高位，皆配置秘書擔任通譯，透過翻譯即能解日語。但也有堅持民族氣節，堅持不說日語者，如林獻堂者，但身旁的秘書施家本、莊垂勝、葉榮鐘等人都是公學校畢業留學日本者，本人無需日文更不用說日語。

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要達到像日本人尾崎秀真般「情意偏深國語勻¹⁴⁶。」實為不易，但由於時常與日本人交往，透過時常耳濡目染，也能夠如大稻埕名中醫師葉鍊金達到「國語能操半可通。¹⁴⁷」的程度，但整體而言對日語依賴程度並不高，但至大正後期能操國語者日增，社會風氣開始大變。

此時受過西式教育且通古典文墨的詩人是最吃香者，成為人人爭相邀請對象，可以教授漢學與新學且受過專業師範教育，受聘赴海外者亦不少，如王少濤就曾至受邀至潮州韓江書院講學。如其〈有懷〉的自況一般「舊學術兼新學術，筆耕衣食樂何如。」書房教育已漸為棄捨，不為當時所重，唯有新舊學術兼善者，方能安身於世。

¹⁴⁴ 蘇孝德：〈祝玉峰吟社開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7 年 11 月 18 日）。

¹⁴⁵ 簡朗山：〈祝始政二十年紀念雜感〉，《臺灣日日新報》第 61 版（1915 年 6 月 17 日）。

¹⁴⁶ 魏清德：〈春風得意樓席上作〉，《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6 年 2 月 25 日）。

¹⁴⁷ 謝汝銓：《奎府樓詩草》（臺北：奎府樓，1932 年），頁 71。



(三) 昭和時期

1930年代由於耆老凋零，受漢學教育社會領導階層僅剩下24%，¹⁴⁸新舊學知識分子權力交替已儼然完成。此時漢文淪落，鄉間塾師竟至「執經誰肯問殷勤。¹⁴⁹」由於日語的普及，日語出現的比率大勝漢文，市道上「同僚卻愧知音少，多為趨炎鄙漢文。¹⁵⁰」年輕人已不再愛漢詩、漢文，而學校中也「不禁時勢推遷感，強半同僚賤漢文。¹⁵¹」學校的教師都不再閱讀漢詩且不教授漢文，此時舊知識分子普遍懷有「秦火當時焚學士，漢文今日誤書生。¹⁵²」慨嘆，「揚文會上憶將軍，振起斯文愛漢文。¹⁵³」已成為永不可復的回憶，原本想藉皇民化振興漢文，到最後也成為語文教育的犧牲品。

1. 書房教育的零落

世人鄙薄傳統漢詩在新學建立後已漸成風氣，日本漢文學者三屋清陰在臺灣立塾教授漢詩，頗得臺灣人士敬重。「教壇不行說靈巫，學究天人笑腐儒。¹⁵⁴」是柳田陵村對他的書寫，漢詩教學不因師者的身份而有異，連日本人研究漢文也被稱腐儒，可見漢文地位低下，已漸漸大不如前。

由於學校不教漢文，民間書房亦停擺，堅持漢學的塾師們，再也無法「生花江夢賴倫魁，圈點文章見異材。¹⁵⁵」由於堅持道統，就像朱點人〈秋信〉小說中

¹⁴⁸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年代臺灣教育與社會》，（新北：城邦出版社，2015年12月），頁77。

¹⁴⁹ 奎五：〈老學生〉，《詩報》第6版（1936年2月15日）。

¹⁵⁰ 張華珍：〈敬和許君山先生瑤韻〉，《台南新報》第8版（1934年7月30日）。

¹⁵¹ 楊嘯天：〈校中雜詠〉，《台南新報》第8版（1934年3月18日）。

¹⁵² 許君山：〈敬步登采君雜感瑤韻〉，《台南新報》第8版（1934年6月6日）。

¹⁵³ 林述三：〈兒玉藤園大將〉，《詩報》第2版（1938年12月16日）。

¹⁵⁴ 柳田陵村：〈和清陰戲作韻〉，《台南新報》第5版（1923年5月5日）。

¹⁵⁵ 芳瀛：〈朱筆〉，《風月報》第45版（1940年1月1日）。



的斗文先生般不合時宜地生活在自我架構的世界中，甚至被貼上「聖語堪傳述，經營笑腐儒。¹⁵⁶」的標籤。

原先負責教育子弟的書房也被新學派嘲笑為「子曰店」，隨著書房陸續關閉，身無長物的老塾師只能「年年浪跡感難拋，學究頭銜藉解嘲。¹⁵⁷」日治中後期學究一詞在國語當道的時代反而成為貶抑，甚至到最後這些滿腹經綸的學者只能在鄉村商店「商品為將書正札，煩他學究寫淋漓。」以潤筆薄酬維生，晚景悲涼。

1940 年代社會領導階層僅剩下 4% 受漢學教育者，絕大多數都是受過新學者¹⁵⁸，懸殊的差異連提倡鄉土文學的黃石輝也有「如今時世正文明，新學難容舊學并。¹⁵⁹」感觸，受戰爭波及和皇民化影響，又將漢文逼到角落深處，再加上詩人凋零，有些吟社甚至只徒有虛名亦未從事集社活動，呈現倒社的狀態。如同王則修〈新春述懷〉最能闡述老詩人的心境：

文明經濟能強國，舊學詩書未療貧。

百事讓人高位置，一生誤我老儒巾。¹⁶⁰

耄耋之年，韶光老去，再加上新學當道，舊學派也只能徒呼時不予我。這時對於舊學也不再堅持，只希望「迎時新學雖尊重，吾道尚存好並行。¹⁶¹」、「讓他新學奮前驅，所欲從心矩不踰。¹⁶²」此時許多詩家也提不起心力創作，再加上承繼者

¹⁵⁶ 林錫麟：〈子曰店〉，《詩報》第 11 版（1939 年 3 月 5 日）。

¹⁵⁷ 奎五：〈村夫子移居〉，《詩報》第 9 版（1933 年 4 月 1 日）。

¹⁵⁸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 年代臺灣教育與社會》，（新北：城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頁 77。

¹⁵⁹ 黃石輝：〈敬和朱阿華先生七十五歲感懷瑤韻〉，《南方》第 32 版（1943 年 1 月 15 日）。

¹⁶⁰ 王則修：〈新春述懷〉，《南方》第 31 版（1942 年 1 月 15 日）。

¹⁶¹ 倪炳煌：〈尊五社兄移居書感敬次原玉〉，《南方》第 34 版（1943 年 2 月 15 日）。

¹⁶² 王則修：〈敬次顏笏山先生古稀書懷〉，《夢覺山莊古稀紀念集》，（臺北：夢覺山莊，1942 年），頁 15。



少，詩社經營已不復往昔。如同顏笏山〈重和子珊移居韻〉：

侍於君子有三愆。躁隱瞽宜戒少年。大道生財堪裕後。讀書達志可光前。
精通互習內台語。文字交遊南北連。深許始終誠一貫。迎新舍舊未嘗然。¹⁶³

顏笏山生於清末，改隸後經歷了日本統治四十餘年，眼見漢文由盛轉衰，更激見漢詩的未來，駱子珊是詩壇中生代，喜愛創作也有詩名，眼見舊學詩人滿腹牢騷，藉筆墨為吐氣，而僻處山麓與世難合。也見識到新派學者或受雇於官衙，或就職於學校，收入穩定富足，風光得意。臺灣人接受總督府的語文教育進而影響改變生活態度與習慣，¹⁶⁴也印證臺灣新舊學派的交替。

2. 西文興起

十九世紀英國號稱「日不落國」，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繼而興起起的美國，西方的文明代表流行與進步。魏清德〈贈西礁石翁〉「羅馬文字喧寰球，埃及文字弔鐘乳，亞東文字亦蕭條……」¹⁶⁵原本國語的推行即已令漢學衰退，隨著西風東漸，古文字所代表的文明榮光，已日漸式微。

西方科學及英語成為新式學校教育也將英語列為學習科目之一。「蟹行文字綴新詞¹⁶⁶」，屢被視為瘴癘之地的臺灣，西醫的數量在此際也勝過中醫。當時恰值追求摩登的時代，西洋餐館、咖啡廳、喫茶店如雨後春筍般林立，羅馬字母書寫的廣告招牌也成為城市街景，甚至昭和5年（1930）郭雪湖《南街殷賑》畫中也可見其蹤跡，洋文充斥街頭。

¹⁶³ 顏笏山：〈重和子珊移居韻〉，《詩報》第8版（1941年8月2日）。

¹⁶⁴ 安田敏朗著，黃耀進、林琪禎譯：《「他們」的日本言：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かれらの日本語：台湾「残留」日本語論〕》，（新北：群學出版社，2016），頁81。

¹⁶⁵ 魏清德：〈贈西礁石翁〉，《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1911年4月3日）。

¹⁶⁶ 林福星：〈臺北仁濟院實習有感〉第10版（1941年10月6日）。



傳統知識分子對漢學危殆的恐懼更加劇。邱筱園在《詩報》第 1 期即以「蟹行文字之曼衍於瀛壖也，漢學危微。¹⁶⁷」告誡諸子當前漢學衰微，希望藉由民眾藉由詩歌創作與投稿來振興漢學，顏笏山〈乙亥（1935）新正戲筆〉「蟹形文字擅橫行，亥豕魯魚辨未精。¹⁶⁸」當時的詩人也都有感受「歐西文字正橫行¹⁶⁹」、「文字於今尚蟹行。¹⁷⁰」、「文字離奇重蟹行。¹⁷¹」……等西洋文字的壓力。林幼春〈戲作息爭吟寄筑客並似春潮〉也曾提及「爾時蟹行文，亦莫余敢侮。¹⁷²」可見西方文字在臺灣社會的盛行。當時臺灣傳統詩人大抵與晚清與中國傳統文人觀念相仿，陳庭瑞也曾連續於《詩報》56、57 期以〈兩文化之管窺及漢學與吾人之關係〉為題進行東西文化探討，也認為：

然而學問有新舊，文化有東西。西洋之學，傾於物質。東洋之學。置重精神。而物質偏重，則平和被脅威。¹⁷³

東方重精神，西方重物質，然而物質若偏重則有害於和平進程與發展，詩人有寓意於筆端，藉以告訴日本當局弁急用忍，孰料竟一語成讖。

3.戰時的漢文的角色

隨著日本政府的野心擴大，終於發展太平洋戰爭，昭和 16 年（1941）12 月 7 日更發動珍珠港事件。原先如火如荼展開的皇民化更徹底，文字也成為動員的工具，同屬東亞文化圈的和文與漢字書寫方式皆為由上至下、由左至右，與由左至

¹⁶⁷ 邱筱園：〈祝辭〉，《詩報》第 4 版（1930 年 10 月 30 日）。

¹⁶⁸ 顏笏山：〈乙亥（1935）新正戲筆〉，《昭和新報》第 14 版（1935 年 1 月 1 日）。

¹⁶⁹ 葉際唐：〈學海〉，此詩收於《葉文樞先生殘稿》。

¹⁷⁰ 盧三多：〈將去柳林感賦〉，《台南新報》第 8 版（1934 年 5 月 24 日）。

¹⁷¹ 張天眷：〈已卯元旦〉，《風月報》第 19 版（1939 年 1 月 1 日）。

¹⁷² 林幼春：〈戲作息爭吟寄筑客並似春潮〉，《詩報》第 5 版（1939 年 4 月 1 日）。

¹⁷³ 陳庭瑞：〈兩文化之管窺及漢學與吾人之關係〉，《詩報》第 5 版（1933 年 4 月 15 日）。



右橫向書寫的西方文字多有不同，自然是可以團結和漢民族的利器。

大正 8 年（1919）日本政治家金子堅太郎即提出「支那語殊音異，惟其文字，則與日本同一，非似英文法文，蟹形文字之難攻也。日本對支那有發展利器，實也此漢文也。」漢學對日本很重要，以臺灣施政來看，漢學有益於兩國交流。¹⁷⁴七七事變後對中原持續進軍，為擴大統治佔領區，並減緩民族反抗此時的漢詩成為「溝通聲氣之絕好工具。¹⁷⁵」如同帝國大學東洋文化研究者稻田尹希望：「臺灣青年把漢文活用去指導中國民眾。¹⁷⁶」此時漢字不僅可以抗歐美也可以團結東方，此時的傳統詩人也認為「漢詩未必不中興。¹⁷⁷」，藉由此契機復興漢詩。

昭和 17 年（1942）後，進入戰爭白熱化時期，「國語而今宜普遍，闡揚聖道振南方。¹⁷⁸」對南洋用兵之際，漢文也聯絡華僑，廣泛宣傳「日華盟好敦風化。須重國文與漢文。¹⁷⁹」，以利推動東南亞西方殖民帝國戰爭，儒家文化代表漢文在戰爭期，成為日方的公倍數，可以在戰爭中動員並無限擴張。

許多詩人也以文字為題創作相關作品，就連日本假名也是由中國文字出脫而來，推廣國語也就是推廣漢文。¹⁸⁰王建勛〈詩幟〉「蟹行歐字今將墜，全賴高飄振八荒。¹⁸¹」以詩為幟，期以撼動人心。李碩卿〈自豐寓基三十年適逢週甲偶賦韻〉「決勝殘棋看指日，王風掃盡蟹行文。¹⁸²」這些詩文都呈現了東方文字要同化西

¹⁷⁴ 薛建蓉，《重寫的「詭」跡：日治時期臺灣報章雜誌漢文歷史小說》，（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5年2月），頁89。

¹⁷⁵ 佚名：〈歲首感言〉，《詩報》第1版（1942年1月1日）。

¹⁷⁶ 稻田尹：〈名士感言集〉，《南方》第10版（1942年9月15日）。

¹⁷⁷ 許成章：〈壽洪特授先生〉，《南方》第31版（1942年5月15日）。

¹⁷⁸ 林子興：〈讀書聲〉，《詩報》第15版（1942年2月20日）。

¹⁷⁹ 瀨川陽一：〈過訪南陔吟社諸君子〉，《詩報》第37版（1943年1月1日）。

¹⁸⁰ 去疾：〈草書雜談〉，《詩報》第21版（1942年10月26日）。

¹⁸¹ 王建勛：〈詩幟〉，《詩報》第15版（1942年10月10日）。

¹⁸² 李碩卿：〈自豐寓基三十年適逢週甲偶賦韻〉，《詩報》第2版（1942年4月3日）。



方文字的氣魄。然而豪語都被戰爭的敗績所粉碎，莫如張達修〈蠹魚〉最忠肯的評論：

鄴架曹倉蠹蠹生，文章典籍任鑽營。

千秋國粹今吞盡，休怪新書盛蟹行。¹⁸³

他認為書中文字不是用來鑽營謀求富貴的，如果不能達到傳道、解惑，或行有益民生之事，西方文字大盛也是不足為奇，國粹衰亡除了日本語文教育的實施，臺灣知識分子的投機取巧、不與時俱進也是漢文衰弱的原因。

不論在皇民化與戰時，日方都極力遏止臺灣白話文報紙發行，以防產生更多非國民。唯獨少禁漢學詩報刊物，從詩作的發展也可以看出島田謹二甚至許多小說家對於舊派漢學作家的嘲諷所在，¹⁸⁴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語文教育政策實施，令更多臺灣人說國語，當漢詩成為少數人能夠創作且被當局控管之時，不僅成為附庸，更失去尊嚴，也就喪失鼓動風潮的主動性。

四、結論

臺灣位於大陸與海洋的交會，自古以來政權不斷更迭。自荷西開始即有語言教育，語文教育四百年來，在這座島嶼一直滾動式進行未曾停歇，只是實施的策略與傳授的語言不同，涵化的本質是不變的，臺灣民眾自始至終處於被動的角色卻從來未曾改變過。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語文是溝通的工具，更是培育國民的方法，透過

¹⁸³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臺中：醉草園，1981年7月），頁11。

¹⁸⁴ 陳惠文、戴振豐：《速讀日本文學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18年9月），頁277-279。



教育的實施，令彼者不僅成為知己者，進而成為己者，納為己用。懷柔的語文政策猶如摻著蜜糖的毒藥，令人麻痺最後失去反抗能力，國語政策的施行，不只教授語文，更是培養新的國民良方，假藉教育之名，培養具新視野知識分子，取代原有文化資源的掌握者，到最後無法撼動殖民政策的施行，才是主要目的。

文言不合自古以來一直是漢文最大的致命傷，漢文賴長久知識積澱方成有成。日治時期力行國語教育政策，大眾都以接受西學、講說國語為榮。漢文瞬間由廟堂跌落民間，授者眾受者寡，供需失衡，自然不再成為文壇寵兒，再加上臺灣人的務實性，漢文也就為日常必須的日語所取代。

參考書目

1. 五味田忠：《臺灣年鑑》，（臺北市：臺灣通信社，1943）。
2. 太田肥洲：《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
3. 片岡巖：《臺灣風俗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
4. 古川ちかし、林珠雪、川口隆行：《日本語在臺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
5. 台灣通信社：《台北市史》（臺北：台灣通信社，1931）。
6. 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1943）。
7.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編輯部：《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準備讀本》，（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3）。
8. 東鄉實、佐藤四郎：《臺灣植民發達史》，（臺北：晁文館，1915）。
9. 河原功：《被擺布的臺灣文學：審查抵抗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



10. 胡律光：《臺灣的教育》，（臺中：莎士比亞文化事業，2007）。
11. 計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記——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4）。
12.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師範大學，2012）。
13. 翁佳音等：《鑽石臺灣：多元歷史篇》，（臺北：玉山社，2010）。
14. 國立臺灣文學館：《第七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0年11月）。
15. 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場域的生成與典律反思——第十二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6）。
16. 張毅鈞：《臺灣詩與詩社》，（臺中：莎士比亞文化事業，2007）。
17.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年代臺灣教育與社會》，（新北：城邦出版社，2015）。
18.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新北：群學出版社，2013）。
19. 陳惠文、戴振豐：《速讀日本文學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18）。
20.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臺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臺北：玉山社，2014）。
21.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1991）。
22. 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臺北：群學出版社，2012）。
23. 飯尾由貴子等：《中心到邊陲的重軌分軌：日本帝國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24. 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25. 黃純青：《晴園詩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26. 椿木益一：《臺灣大觀》，（東京：大阪屋號，1923）。
27. 溫又柔著、黃耀進譯：《我住在日語》，（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7）。
28. 經典雜誌：《臺灣教育四百年》，（臺北：經典雜誌，2006）。
29.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
30. 廖一瑾：《臺灣古典詩選、詩集、詩社與詩人》，（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
31. 種村保三郎：《臺灣小史》，（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5）。
32. 臺南共榮會：《南部臺灣誌》，（臺南：臺南共榮會，1934）。
33. 臺灣治蹟研究會：《臺灣事蹟綜覽第二集》，（臺北：臺灣治蹟研究會，1919）。
34. 臺灣救濟團：《佐久間久馬太》，（臺北：臺灣救濟團，1933）。
35.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府，1933）。
36. 遠藤所六：《臺中市史》，（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
37. 蔡元隆、黃雅芳，《讀冊真趣味：從懷舊老物件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20）。
38. 黎振君：《客庄生活影像故事3—凝視頭份·張阿祥》，（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2012）。
39. 戴月芳：《臺灣文化協會》，（臺中：莎士比亞文化，2007）。
40. 謝崇耀：《百年風華新視野：日治時期臺灣漢文學及文化論集》，（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2009）。



41. 吳佩珍等：《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上（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42. 蘇碩斌等：《聚焦臺灣：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